

# 元明清时期滇黔地区宗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古永继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多民族杂处的西南地区,历史上宗教信仰普遍,内容丰富。本文对元明清时滇黔地区的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发展概况及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元明清;滇黔;宗教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元代崇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也较兴盛;明清时则总体走向衰落,统治者在思想上信奉理学,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主张下,实际以儒学为主,释道并用,宗教儒学化。在多民族杂处的西南滇黔地区,由于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等原因,其宗教的发展与内地不完全同步,元明清时仍宗教信仰普遍,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等均各有不同表现及特点。

## 一、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以反映人和自然的矛盾为主要内容,滇黔地区大多数民族中都有存在,其特征是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灵魂和鬼神等,并通过各种与之相应的祭仪和巫术体现出来。著名者如白族的本主崇拜,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之类。本主,为村寨祀奉社神的总称。被尊为地方保护神的本主,有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民间英雄、烈妇孝子、自然神灵、佛道神祇等。本主崇拜表现特征为多神并立,活动场所固定,无系统的教义和神学理论,无专业神职人员。东巴教受藏传佛教影响较大,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巫师称为“东巴”,有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经”。毕摩教,崇拜神灵、祖先、鬼魂,以毕摩为祭师主持宗教活动,并教授彝文、翻译彝经、为人占卜等,亦称鬼教。贵州地区的原始宗教多崇拜巫鬼,如明代贵州宣慰司水西罗罗(彝族),尊男巫为鬼师,杀牛祀神,名曰“做鬼”;中曹司仲家(布依族),“疾病不服药,惟祀鬼神而已,卜用茅或铜钱、鸡骨”。[1]原始宗教内容丰富,形态复杂,涉及广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巨大,直至现代,仍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原始宗教残余继续存在。

## 二、佛教

佛教在汉唐时即已影响滇黔地区,两地的表现各有异同。

云南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昌于元,盛于明,衰落于清。其特点,首先是教派复杂。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结构,佛教各派传入的时间、路线不一,因而产生不同教派。从北部传自中原者是一种本土化的汉地佛教,即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用汉文译写经典的佛教,或称北传大乘佛教。经缅甸北部传入的梵文经典系列佛教,为印度密宗。从西南亚沿云南西南部传入的巴利文经典系列佛教为印度南传佛教,亦称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从西北藏族地区传入者,为源于印度而成于西藏的藏文经典系列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不同来源佛教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以各种方式扩大影响,并与当地民族原始宗教结

合混融发展。滇池周边汉族、彝族地区与内地交往密切，主要流行北传大乘佛教中的禅宗；洱海大理白族地区以印度瑜伽密宗同本地巫教结合而形成的滇密最为显赫，僧人称“阿吒力”（阿闍力），故又称阿吒力教；滇西北丽江等地与西藏相邻，当地藏、纳西、普米等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滇南、滇西边疆傣、佤、阿昌、布朗等族地区，以南传上座部佛教占绝对优势；滇东北及川黔相交以彝族为主的曲靖、乌蒙、乌撒地区，则信奉佛道与原有巫鬼教相杂的混合诸说。

其次是官方大力扶持。元朝推崇佛教特别是藏传喇嘛教，元世祖封其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其徒分布各省，在云南者为“梁王师”，地位至尊，南诏、大理时即有相当基础而带藏传密宗色彩的阿吒力教遂成为当时云南佛教中的主流；云南王忽哥赤及赛典赤、也先卜花等行省官员并先后主持，创建或修建了昆明五华、大胜、筇竹、大德、圆通、罗汉、华亭诸寺。明代随着内地汉族移民的增多，倡兴于元代的禅宗逐渐取代密宗地位。洪武时曾颁布圣旨，发中原僧人讨度牒者 20 以上到“乌蛮、曲靖”即今黔西北、滇东北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寺，自耕自食”，教化当地民族。此期间大理感通寺和尚无极、昆明筇竹寺和尚崇证先后至京朝觐均受优待，无极回滇时朱元璋赐诗赠名，并命翰林学士李翀等赋诗相送。朱元璋还根据礼部转呈云南兴祖寺僧人性海等所请，颁发“护持山门榜文”，张挂云南乃至全国各地寺院以作庇护，禁止诸色人等轻慢佛教、骂詈僧人。[2]武定人智光和尚，被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广善大国师，在京受到重用，洪武、永乐时先后 3 次奉使乌斯藏，“翻诸经，多所译解”，“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3]从沐英开始，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氏历代及当地官府对云南佛教也扶持有加，昆明众多寺庙都接受过沐氏或官府的捐资修建。明代推行府州县三级僧官管理制，设有相关机构，府设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人；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各置僧正、僧会一人。云南全省僧官三司共 27 处，下辖仪仗 473 寺、46 庵；其中云南、大理、临安、永昌等 13 府设有僧纲司，云南、大理二府另设有阿吒力僧纲司；一些佛教势力活跃的州县，如安宁、晋宁、昆阳、嵩明、赵州、邓川、腾越、剑川、北胜 9 州设有僧正司，宜良、云南、定远、大姚、浪穹 5 县设有僧会司。[2]其三，佛寺林立，僧侣活跃。元成宗元贞时，律积速以“王师”身份掌管省内宗教事务，在他就任期间，“修葺云南诸寺大小一千余”。[2]至明末天启时，全省各地所建而尚存的寺庵多达 623 所，确载为元代创建者 34 所，明时建者 78 所；而仅昆明地区，即有 50 多所。[4]明代滇西鸡足山，则有“大寺八，小寺三十四，庵寺六十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2]成为与内地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峨眉、普陀、九华比肩齐名的全国著名佛教圣地。设有僧纲、僧正、僧会等司地区佛寺也众，并多分布于原大理段氏时八府四郡之地及明初设置卫所区域。此时期云南僧侣活跃，高僧辈出。著名者如元代雄辩、玄鉴、大休、定林、崇照、慧喜、海印、月智，明代古庭、净轮、波罗、道安、智海、朗目、本智、儒全、释禅、寂忍、净月等等，成为了滇南佛教中兴的骨干。内地僧人多游方云南，或路过，或长住，明季外省籍者又以四川人居多。《滇志·方外志》载元明时昆明地区著名和尚 12 人，其中籍贯明确者省外 3 人，2 人即为四川籍。故近人陈垣先生著文，有“滇黔僧多蜀籍”之语。[5]但云南佛教基础深厚，僧人队伍的主体仍是本地人。滇籍和尚也常出游四方，拜师求学。如元代善阐人雄辩大师赴中原学习禅宗 25 年，回滇后至昆明玉案山筇竹寺阐教，并以当地彝、白族语“乌爨言”说法，使禅宗影响得以扩大；曲靖僧玄鉴、赵州僧普通等至浙江天目山参学于临济祖师中峰明本禅师后回滇；明正统时昆明僧古庭，走金陵，游贵州，入四川，最后回滇建归化禅林。万历时曲靖僧人本智，戒行高洁，名动京师，曾为慈圣太后讲经布道，宰官汪可授、陶望龄、袁宗道等执弟子礼。另外云南距京遥远，也成为明代惩罚罪僧或统治者争斗失败后依托空门遁迹的理想之地。明初曾有日本僧谪居云南，昆明五华寺、圆通寺及大理有关资料中，都记有他们活动的足迹；武定狮子山，则留有“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出逃隐居该地为僧的若干逸事传说。[2]清代前中期，云南的佛寺兴建基本保持了前代势头。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祠祀考记载，道光时全省庵寺达 1650 余所，而可以肯定建于清代者有 587 所，较明代又有增长；其中大部分为汉传佛教寺庙，小部分为藏传佛教喇嘛寺，还有部分傣族地区的南

传佛教“缅寺”未能计数于内。咸丰、同治期间，云南社会动荡，兵戈相扰，大量寺庙在战火中被毁，僧尼随之流失减少，汉传佛教受到沉重打击而自此一蹶不振。

其四，佛教多与道教融合，势力超过道教。明清史载中，常见云南各地佛寺、道观交错混杂。如昆明城内佛教胜地圆通寺，其中有“好事者”建道教玄天阁、吕仙阁于其崖上。碧鸡山罗汉寺，寺内殿阁累累，寺之南北则被道观夹峙：“南去为南庵”，有福寿殿、祖师殿、飞龙阁，“傍有赵道人墓”；“北去为北庵”，有弥勒殿、灵官殿、玉皇阁、太清宫等。[4]有的地方，寺、观住持往往僧道难分。如明末徐霞客游滇，见鸡足山碧云寺僧师住处竟为真武阁；漾濞县金牛屯玉皇阁初创于朱、史两道人，后又“有僧三贤扩而大之”。有的和尚所研习经籍，也是释道相混，鸡足山悉道寺僧所著书，即有《禅宗赞颂》、《老子元览》等。[6]而佛教虽多与道教混融，势力、影响却要大得多。有关方志中所载各地寺观，佛寺普遍多于道观。徐霞客游滇西，沿途食宿多由僧人接待，数量不多的宫观有的还被僧人占据。如剑川金华镇道宫，“宫中焚修者非黄冠（道士），乃瞿昙（和尚）也”。唯腾冲宝峰山有寺有阁，寺少阁多，道教势力稍强，徐霞客为之感叹：“他处皆释盛于道，而此处独反之。”[6]还有不少地方，释、道、儒三教相融，佛寺、道观与儒家文庙、学校交相杂处，三教圣人偶像同时得到供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以“三教”为寺观名称的宗教活动场所。

其五，士子宦宦好佛，多寓读寺院及参佛建庙。元明以来，滇地初辟，多未设学，全省学宫、书院数量远远少于寺庙且多位于城市，潜心修学之士喜好清静，往往至寺院幽僻之处习读讲学，各地寺僧也乐于士子来往接交，互施影响，相得益彰。明末徐霞客游滇览胜，即在嵩明云灵山法界寺、安宁葱山曹溪寺、昆明玉案山箬竹寺等地遇见过若干寓寺就读的书生。宦宦士人中并产生了一大批悦禅而不出家的佛门居士，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舍地施钱、建寺修庙、罗致经籍等，从各方面对当地佛教给予支持。著名者如元代姚安路总管高明，“捐己资，即私第之里缮修妙光报恩禅寺，中建宝殿，像释迦文佛，又割上腴若干以饭四方之僧”；[2]明嘉靖进士大理太和元阳，居官还乡40年，潜心著述，读书鸡足山数年，“创建放光寺，施置常住田数百亩，山中寺院倾颓者，无不修葺，兼为撰文立碑；鸡山之盛，推为功首”；[5]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增，万历末于鸡足山创建悉檀寺，又于鸡山华严寺建藏经阁，九重崖建一衲轩，文笔山建尊胜塔院；清初姚安土知府高爵映，一门三代深结佛缘，所著《金刚慧解》、《定观经解》等，对佛学禅理多有明见。儒释参融，相互影响，成为云南佛教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

贵州佛教，受中原和云南影响，流行的主要是密宗、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又主要是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并传而临济独盛；其发展脉络，整体上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元代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皆注重神通灵异，与黔地原始巫风相契，遂使佛教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随着明代官府兴教政策的支持及内地移民大量进入的影响，僧徒增加，寺庙普建，其中相当部分为当地流官土司主持兴修。史载贵州佛寺数百所，可确知始建者，元代6所，明代147所，清代48所。[7]除省城大兴寺、龙泉寺等外，清平圣寿寺、都匀观音寺、安顺圆通寺、新城护国寺、毕节普慧寺、赤水普丰寺等都较有名。特别是南明永历帝驻蹕贵州及南明亡后，跟随入黔士大夫多逃禅出家，从而使贵州佛教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清康熙时如纯辑《黔南会灯录》载明季黔僧百余人，因世乱披剃者即占其中近五分之一。贵州僧人以川籍居多，《黔南会灯录》所载之黔僧，蜀人居十之七八。从明末至清初，贵州境内出现了以丈雪、语嵩、赤松、瞿脉、厂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佛教思想家，在佛教哲学思想上呈现出了强烈的时代和地方特色。不少地方寺院利用天然洞崖建构，如贵阳的麒麟洞、安顺的石佛洞、兴义的大佛洞、湄潭的观音洞、施秉的华严洞、贵定的牟珠洞、黄平的飞云洞等。一些佛教名山也纷纷涌现，如黔北遵义金鼎山、禹门山，黔东梵净山、思南中和山、铜仁六龙山、万山中华山，黔中贵阳东山、相宝山、黔灵山、平坝高峰山、

息峰西望山、贵定阳宝山、广顺白云山，黔东南黎平南泉山，黔西南盘县丹霞山等；其中以黔东梵净山最为著名，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为明清时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与蜀之峨眉、滇之鸡足鼎立西南，直至清初康、乾之世，香火一直不断。清中后期，贵州佛教走向衰落。其原因，一是贵州佛教日益功利化、世俗化，使其本身病态百出，内部生命力渐失；二是在“咸同兵乱”和“庙产兴学”中遭受重创，外部条件恶化而难再进一步发展。贵州也有佛道混杂合流而势力大于道教的特点，僧人住持道观、兴建宫阁，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来，屡见不鲜。如兴义府普安厅城南丹霞山护国寺，明万历时僧玉建元真观于其顶，每年三月道家祖师圣诞日，“川滇及本省来进香以千数”；[7]思南中和山华严寺，始建于宋代，嘉靖时道人魏洪、冯静道、僧人正泰于寺内共建观音阁。同一寺观之中，佛仙鬼神共存祭祀，已为常见惯例。各地僧道人数，僧多于道。据记载，贵州有名僧道，明代僧人43名，道士32名；清代僧人93名，道士10名。[7]贵州也常见士大夫于僧寺读书讲学者，如明万历时江西吉水人邹元标，谪戍都匀卫6年，黔士从游者众，其讲学即多在僧寺，都匀观音寺、胜寿寺及麻哈静晖寺等地都留下他讲学的足迹；士子禅悦者也不少，明代贵州著名文士潘润民、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等都与僧人交往密切，佛门禅学的影子在其诗文作品中屡屡可见。这对当时贵州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宣传扩大和推动的作用。贵州佛教思想的流传，主要在城镇卫所汉族之间，土著居民有的也受影响，明代普安州风俗中，即有“事商贾，喜佛老”，当地“阿缚蛮喜诵佛老经典”的记载。[7-8]

### 三、道教

道教为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在其形成过程中继承吸收了相当部分古代巫术和神仙方术内容，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汉族特别是下层民众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中原内地，道教最兴盛是在宋元时期，至明清已走向衰落。滇黔地区，汉晋时已有传入，明清时随着大批内地汉族移民入迁而影响不断扩大，并呈现以下特点：

1、活动地区广阔，影响深入社会生活。道教在滇黔地区的活动，元代较为沉寂，明清时发展兴盛。此时流行于云南者主要有武当道派、全真道天仙派、龙门派、长春派，流行于贵州的主要有全真道龙门派、正一道天师派、萨租派等。当时志书中，普遍可看到有关道教活动的踪迹。如明代云南腹地20府1直隶州，除丽江、顺宁、永宁、镇沅4府外，各地都建有道教宫观，仅省城昆明内外，即有供奉道教神灵的长春观、昭灵观、真庆观等10余处；云南、大理、永昌、楚雄4府，设有管理道教事务的道纪司；滇黔各地，均有不少祭祀三清、玉皇、真武、吕祖、关圣、武侯、城隍、山川、风云、雷雨、财神、龙王等道教神灵。道教意识还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习俗。如昆明地区，人们在二三月份出游踏青，二月二日朝谒龙泉观；三月三日谒南岳庙，谒真武于西山罗汉寺或东郊鸣凤山金殿；有的甚至直接“负香之郕襄谒武当，往返数月”，以表虔诚之心，[4]不少地方盛行崇道时俗“三元节”，以及同道教相关的庙会活动老君会、东岳会、城隍会、南斗会、北斗会之类。一些彝、白、纳西等族地区有由民间道士与信徒组成的洞经会，于道教节日用音乐伴奏的形式设坛做会，举办活动；有的地方则有以道、佛、儒经典为指导，自称“以代天传旨、教化人民为务”的圣谕坛。在贵州，著名者则有道教与民间逐疫驱鬼仪式傩祭相结合的各种傩坛、傩戏等。滇黔地区的道教不仅兴盛于汉族之中，在当地不少民族中也影响很大，以致当代有的学者竟认为中国文明尤其是道家文化的源头应当到彝族中去寻找。[9]

2、著名道士活跃，各地多建道观。明初不少著名道士到云南、贵州活动，收徒传教。如洪武、永乐时武当道派创始人张三丰一度寓居贵州平越高贞观，与指挥张信关系密切；至滇则吸纳江南滇滇富户沈万三翁婿及其外孙女西平侯沐春夫人余飞霞等为弟子，“昆明礼诰迎神”，“始于三丰”。[2]永乐时，全真派重要传人长春真人刘渊然谪居昆明龙泉观，滇人慕名，“咸往求济，无不得所愿欲”；洪熙时刘受召回京“领天下道教事”，宣德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使云南道教声望大振。[10]明清时各地还有不少本地

籍道士，如云南昆明地区有刘可成、杨用广、毕正宗、吴来清、杨汝兰，大理有芮道材、陶浚澜、杨洲鹤、董天台、余常清，临安有姚成、郑颠仙、赵紫霞、李金阶；贵州遵义府有张颠仙、张太虚，黎平府有江南纪，镇远府有李道坚、白云道人徐贞元、丹霞道人张守戒，铜仁府有天龙相公杨再从等。道观数量虽不及佛寺，但也不少。据记载，云南所建道观，明代103所，清代142所，加上以前历代所建及年代待考200余所，至清末云南共有道观465所，其中不少在嘉庆以后得到重建与新修；最著名者为明万历时云南巡抚陈用宾仿湖北武当山制，于昆明东郊鸣凤山用全铜建造以供奉北极真武上帝的太和宫“金殿”。贵州地区道观至清末42所，其中建于元代6所、明代29所、清代7所，这无疑只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个部分。[11]

#### 四、伊斯兰教

云南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是在元军据滇后，大批穆斯林西来而形成；回回人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更促使了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部下有许多回族将士为之效力，因而对伊斯兰教采取优待扶持政策；在移民戍滇时，其中有相当部分回族，更使其教教徒人数增加。云南回族主要集中于交通沿线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呈大分散、小聚居局面。明末徐霞客游滇，在昆明曾受到回族马云客盛情款待，“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也”。[6]明代云南伊斯兰教教徒，已有“朝天方”即赴伊斯兰教圣地阿拉伯麦加朝觐的活动。现存昆阳郑和公园内的“马哈只碑”碑文，即有明代宦官、大航海家昆阳人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参加过这一活动而被尊称为“哈只”的记载。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宗教活动场所。万历《云南通志·寺观志》载云南、大理、姚安几府有清真寺、礼拜寺，天启《滇志·祠祀志》言云南府有清真寺二，“一在崇正门内，一在崇正门外，俱元平章赛典赤建，各郡县间有之”。据云南穆斯林相传，赛典赤曾在昆明地区创建清真寺12所，除上述崇正门二寺外，五华山、顺城街、鱼课司街、大西门外、桃园村、金牛街、珠玑街、云津市场附近等地也分别建有清真寺。另外，元代回回聚居较多的大理、建水等地也有修建清真寺的记载。清代云南的清真寺兴建较为广泛，且多建于道光以前，凡有回族集中的城乡，几乎都有相当数量的清真寺建立。如雍正时，清将哈元生所带回军队随鄂尔泰至昭通一带强制推行“改土归流”，即在当地建盖清真寺48所。[12]清代的伊斯兰教处于受歧视和压抑境地，但经长期发展，已有广泛的基础和强大影响力。一些学者还进行了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学术活动和开展经堂教育以培养本族人才，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咸丰、同治间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大批回族群众惨遭杀戮，大量清真寺被毁，云南的伊斯兰教也受到沉重打击，直至民国以后才逐步恢复。

贵州的伊斯兰教同云南一样，元明时期随着内地移民的进入而产生。元初蒙古军定云南、入贵州，部分色目军人、平民、商贾落籍当地，成为回族入居贵州之始。明代内地移民大量入迁滇黔，加上官府在西南多次用兵，更增加不少江南、陕甘一带回族定居者。清前期，统治者在贵州及滇东北等地推行“改土归流”，内地回族将领哈元生、冷大雄、哈国兴等先后率兵驻防有关地区，最后落籍生根，形成回族移居贵州的又一高潮，黔西南的普安、兴仁、兴义、贞丰、晴隆等地成为贵州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伊斯兰教为全民信仰的宗教，回族聚居之地一般都伴有伊斯兰教的产生及清真寺的兴建。因而贵州各地随着回民定居者的增多，伊斯兰教势力也发展起来。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革命和云南回民起义的影响下，黔西南的回族也起兵响应，在张凌翔、金万照等领导下发动起义；但不久起义遭镇压而失败，贵州伊斯兰教的发展转入低潮，进入民国后才复转兴盛。

#### 五、基督教

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基督教指与佛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罗马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在我国，通常把罗马公教称为天主教，而把新教称

为耶稣教或基督教，即狭义基督教。明清时流行于滇黔地区的，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在云南的活动较早，元代《马可波罗行纪》及有关史料中的云南，已有属天主教而被称为“聂斯脱利派”教徒或“也里可温”的记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成都，许多天主教徒纷纷外逃避难，其中有的迁到滇东北盐津一带定居，成为正式天主教进入云南的第一批教徒。明亡后，南明政权建立于南方。永历二年（1648），德国耶稣会教士瞿纱微在桂林为永历皇室授洗，接受洗礼者还有部分皇室人员及大臣。南明政权希图取得外界支持而恢复明室，于永历四年以太后名义向罗马教皇上书致意，早已洗礼入教的太监庞天寿也同时上罗马教皇和耶苏会会长书。后来永历小朝廷展转入黔、入滇，从而使天主教也传入当地。永历皇帝死于昆明后，部分随从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天主教徒留了下来，逐步散布到民间。康熙三十五年（1696），云南设立天主教区，由于信教者不多且分布零散，未能展开实际工作。康末乾初，法国神父雷勃郎、传教士马蒂亚先后受命为云南教区主教，但均未实际到任。不久，云南教区并入四川。嘉庆时清廷取缔天主教，各地传教活动受阻。道光时云南教区恢复，法国神父袁若瑟任主教。此后，以主教公署所在地盐津为基地，天主教势力逐渐向省内扩展，昭通、大关、邓川等地纷纷建立教堂。咸丰七年（1857），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其中规定外国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这更为天主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云南此期间爆发了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前后 18 年，涉及全省大部地区，不少地方如临安、通海、江川等地教堂尽被摧毁，教会扩展大受影响。光绪时，法国神父古若望为云南教区主教，在官府支持下，把主教公署由盐津迁至昆明，于平政街设立主座教堂，并在城内修建教会设施多处，从而以昆明为中心，在全省各地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云南共有天主教徒 11390 人，外籍传教士 55 人，中国籍传教士 8 人；三十四年，云南地区先后建有天主教堂 59 所。[2-13]信仰天主教的主要是汉族、白族、彝族及少量的藏族、苗族、拉祜族和傣族等。

作为新教的基督教，教派组织繁多，清代涉及滇黔的主要有英美不同系统的内地会，英国圣道公会（后改为循道公会），英、美等系统的五旬节会，美国浸礼会、浸信会等。新教最早由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传入云南。光绪三年（1877），麦嘉底自上海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八莫考察，成为新教在云南的第一个传教士。七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在大理建立了第一座教堂；次年，内地会又在昆明建立一座传教总堂。九年，圣道公会派英国传教士索理仁由上海经四川宜宾到滇东北苗族地区传教，并于两年后在东川开办教会。十三年，又派传教士柏格里到昭通，4 年后在该地建立起圣道公会西南教区。二十五年，英国传教士梁廷栋在曲靖建立了内地会组织。二十六年，浸信会开始从缅甸派出传教士进入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地区，逐步发展教徒。二十七年，英国传教士马锡龄夫妇被上海内地会派到大理，三年后到凤庆传教时脱离内地会建立了五旬节教会。二十九年，英国传教士党居仁在昆明中和巷建立了云南内地会总会计处，统一指挥内地会在云南的传教活动。三十三年，浸礼会从缅甸传入云南瑞丽，逐渐发展到陇川、盈江一带景颇族地区。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二年（1901~1910）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局势、社会形态的变迁及西方教会加大对云南传教的力度，新教在云南的传播取得了显著成绩，教徒发展到五六万人，教堂散布云南城乡。[14]新教的信仰者主要为苗族、傣族、怒族、景颇族、拉祜族及部分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占绝大部分。

天主教传入贵州，最早在明末万历年间。此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京与官绅士人交往，不少人从而信奉天主教。思南王家祖上为举人，进京考试时入教，后回贵州做官，许多家族成员在其影响下信奉天主教，并世代相袭，逐步扩展，使思南、务川一带成为贵州最早传布天主教的地区。贵州天主教三大教区之一石阡，据说最早的两家教徒吕家和沈家为明末由江西迁来，在来石之前即已奉教。南明永历皇室及部分随从入黔前已入教，在其影响下兴义地区也有了教徒。[15]外国传教士入贵州活动，则始于清初。康熙四十三年（1704），广东宗

座代牧兼贵州代牧意大利传教士都嘉禄先后派出3个传教士到贵州探察。五十一年，四川宗座代牧法国人穆勒勒出视贵州，至思南、务川等地吸收数人入教。乾隆二十一年（1756），法国传教士罗方济相继任四川代牧兼管贵州教务后，又亲到思南、务川一带吸收教徒。此后，外国传教士不断进入贵州，频繁活动于贵阳、遵义及黔东南地区。嘉庆时官府禁教，外国教会一度无法自由活动。鸦片战争后限制取消，教会活动恢复并进一步活跃。道光二十六年（1846），罗马教皇设贵州为独立代牧区，法国神父白斯德望为首任贵州牧区主教。白先后派遣教士多人到兴义、贞丰、安龙、罗甸、册亨等地传教建堂，设立新教区。至咸丰三年（1853）白病死而胡缚理继任主教时，贵州天主教徒已达2000多人，全省包括贵阳、遵义、铜仁、安顺、毕节、黔南等地区近20个州县开教。胡缚理在任期间，更于贵州各地购买土地、修建教堂，并出版《教区日报》等，使天主教势力在贵州迅速膨胀。至同治五年（1866），仅镇宁县城，即有80%的城内人户入教，城郊入教者则达90%。[16]

新教势力进入贵州较晚。光绪三年（1877），英国内地会派遣传教士祝名扬由湖南入贵州开辟传教点，首先在贵阳车家巷建立福音堂作为贵州基督教内地会总堂；光绪十年、十四年，又先后派传教士白礼德、党居仁到安顺、威宁等地向苗、彝等族传教。光绪二十九年，英国圣道会教士柏格理至威宁，深入附近苗区，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等。从而在黔西北的赫章葛布、威宁石门坎成立了两个著名的教会组织“基督教内地会葛布教区”和“基督教循道公会石川分联教区”，影响波及相邻的滇东北和川南大部分地区。后来葛布教区发展最盛时，领有4个分教区22个教堂，教徒近3万人，其中苗族教徒占80%以上；石门坎教区则领有教堂50余所，教徒近6万人，附近地区大部分苗族村寨95%以上都成为信徒。[16]

## 余 论

滇黔地处西南边陲，自古山川险阻，多民族杂居，长期以来同属于偏僻落后而不乏神秘的“西南夷”之地，明永乐时贵州单独置省后才从行政上与云南分开，因而两者在许多地方一直存在不少相似乃至相同的东西。宗教上，当地民族最先信奉的多是本土文化中孕育生长的各色原始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入，使原来单调沉闷的局面变得活跃，有的一个民族只信仰一种宗教，有的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有的一种宗教多个民族信仰，使得许多民族和地区中出现了多教并立、混融杂处、互相影响兼容的多元格局。道教传入最早，与当地宗教结合，影响广泛，但佛教进入后发展迅速，除与先期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儒、道相融合一外，还与当地原始宗教互相适应，不断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使许多地区和民族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到思想观念都深深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从而使道教退居于附庸和配角的地位，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局面。伊斯兰教为回族全民信仰的宗教，也是回族群众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但由于该教不致力于对外宣教传教吸收教徒，且实行的是族内婚，女子一般不外嫁，外族女子嫁入者也必须尊重回族礼俗和教规，所以该教的发展仅局限在本民族之中。基督教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而大举进入，在当时形势下被当作侵略中国的工具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图，因而在传播中曾引起了人们的各种抵制反抗而使“教案”频频发生，著名者如光绪时云南的浪穹教案、路南教案、昆明教案，咸丰、同治时贵州的青岩教案、开州教案、遵义教案等。但开发较晚而偏僻落后的滇黔，西方传教士进入的更多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他们在传教时往往采取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收养孤儿、创制民族文字、提倡文明生活习惯等，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对打破当地长期的封闭状况，开阔人们眼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能取得人们的好感和欢迎，从而在一些民族中取代当地原始宗教而占居了优势地位。

各种宗教在滇黔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打破了民族宗教的狭隘界限，促进了各族间的相互了解、交流及融合，在总体上形成了多元并存、互相兼容的格局，而且无论是国内异地或是国外传入的宗教，在滇黔地区都被本土化、民族化而产生了形式多样、颇具特色的宗教文

化，这是滇黔地区宗教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当然，滇黔两地相似之处虽多，但宗教发展的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云南历史文化的积淀毕竟比贵州略为厚重，因而其宗教氛围也比贵州更浓和发展时间更早一些。云南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和经济文化条件，在接触外来宗教时往往先行一步，远在唐宋时的南诏、大理，佛教思想即影响深远，直至元代，大理白族地区仍是“间无贫富，家有佛堂，老幼不释数珠”，“山无不寺，寺无不僧”，<sup>1</sup>而贵州佛教发展的顶峰则在明末清初；在其他宗教的发展上，大致也有类似的差异。今天云南有关宗教历史方面的资料比贵州显得丰富的现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此问题。

#### 参考文献:

- [1] 嘉靖 贵州通志[M]。
- [2] 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M]。
- [3]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
- [4] 天启 滇志[M]。
- [5]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
- [6] 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M]。
- [7] 民国 贵州通志[M]
- [8] 王路平，贵州佛教引论[J]，贵州文史丛刊，1998（3）。
- [9]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0] 陈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1]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M]，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 [12] 民国 昭通县志[M]。
- [13] 秦和平，近代云南基督教传播述略[J]，世界宗教研究，1988（4）。
- [14] 杨学政，云南宗教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5] 贵州宗教史料[M]第1辑。
- [16] 孔玲，洋教在贵州的传播及其影响[J]，贵州大学学报，1999（2）。

##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of Religions in Dian-Qian Areas during the Yu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 Yong-ji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650091)

**Abstract:** In history, religions and believes are catholic and varied in southwest area with multiple nationalities. This thesis makes an elementary analyze and discussion for general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s of primitive religion, Buddhism, Taoism, Islam, Christianity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Yu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an-Qian areas; religions

收稿日期: 2003-06-22

作者简介: 古永继，(1953—)男(汉族)云南昆明人，史学硕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

授。

(责任编辑 晓斌)

---

1,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 101《宗教考一》。